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21

常德方言區屬的探討

Zehan WE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魏澤翰 (2021)。常德方言區屬的探討。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編)，《考功集2020-2021：畢業論文選粹》。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This 文字、文獻學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常德方言區屬的探討》

學生：魏澤翰

指導老師：許子濱

論文題目：《常德方言區屬的探討》

學生：魏澤翰

指導老師：許子濱

學校：嶺南大學

學年：2020-2021

提要

現行官方與主流觀點普遍認為常德方言屬於西南官話區，但是不少學者對常德方言的西南官話性質表示懷疑，認為常德方言不具有西南官話的代表性，並且其含有西南官話的過渡性質及相當的湘方言因素。因此，本篇論文回顧了相應的古代記載以及近現代學者的觀點，重新探討了“常德方言是否應劃入西南官話區”的問題。論文以西南官話和常德方言的主要特徵作為研究對象，另外也涉及與之相關的湘方言的內容。大體上，論文的研究角度側重於語音特徵尤其是聲調調值，以及歷史源流兩個方面。具體而言，論文通過比較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湘方言，甚至是江淮官話之間的關係，試圖選擇一個比較合理的方言區作為常德方言的區屬。最後，論文得出了“常德方言以劃入西南官話區為宜”的結論。

謝辭

本篇論文承蒙恩師許子濱先生的悉心指導，得以完成。疫情肆虐其間，無臨大學圖書館之機，研究之途自然困難重重，但與許教授的網上溝通使得論文撰寫柳暗花明。

大學四年，感謝許子濱教授的音韻學、漢語通論課程，還要感謝徐剛教授的漢語方言、現代漢語課程。這些課程使得我在研究與論文撰寫中汲取了知識養料。

感謝參考文獻的作者，他們的傑作使得我在研究過程中如魚得水。也感謝於書籍難尋之際願意伸出援手的藏書者，重現了那些珍貴的古代記載。

魏澤翰

2021年春

目錄

緒論.....	1
一·西南官話內部結構的地位差異.....	4
二·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的聲調關係.....	6
三·常德方言的西南官話過渡性質.....	10
四·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湘語的歷史關係.....	15
五·常德方言以劃入西南官話區為宜.....	19
六·結論.....	21
參考書目.....	22

緒論

常德方言¹歷來在方言片區歸屬問題上界域未定。於現行相對權威的集大成作《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可窺今常德方言屬於西南官話-常鶴片。²至先，在趙元任先生<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China>一文所附的<Linguistic Map of China>中可見常德地區屬於“South Western Mandarin”一區。³當然，也有其他學者依自立體系將常德方言劃入常澧片或湖廣片。⁴總體上，主流及官方學術研究者基本界定常德方言應屬西南官話，且後世之作大多對此認同而論說觀點。

但亦有學者對常德方言的西南官話特徵表示懷疑。如黃雪貞《西南官話的分區（稿）》一文所附的西南官話分區圖未將常德地區列入西南官話區。⁵鮑厚星在早期給湖南方言分區時，將常德方言納入江淮官話區，且與西南官話區有所區隔。⁶呂儉平認為“湖南境內的西南官話方言點都有過渡性質”。⁷李藍也認為“無論是就常德的方言地理位置還是就常德話的語音系統，都是一種過渡性相當明顯的西南官話，把它作為西南官話的代表，其代表資格就要大打折扣”，並且“常德話本身含有相當的湘語因素，並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話”。⁸因此，常德方言是否符合西南官話的特徵標準有待探討。

¹ 本文所涉及“常德方言”，均以鄭慶君《常德方言研究》中界定的“常德市”作範圍，即“老常德市，即今武陵區。1988年常德地改市，原常德市改名武陵區”，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頁1

²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編《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1987，頁1568

³ Yuen Ren Chao,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02, No. 2 (Aug., 1943), 1943, 頁65

⁴ 劃入“常澧片”見陳暉，鮑厚星，《湖南省的漢語方言（稿）》，《方言》，2007年第3期，頁251；劃入“湖廣片-湘北小片”見李藍，《西南官話的分區（稿）》，《方言》，2009年第1期，頁79-80

⁵ 詳見黃雪貞，《西南官話的分區（稿）》，《方言》，1986年第4期，頁264-265

⁶ 詳見鮑厚星，顏森，《湖南方言的分區》，《方言》，1986年第4期，頁275

⁷ 呂儉平，《漢語方言分布格局與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關係》，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350

⁸ 詳見李藍，《湖南方言分區評述及再分區》，《語言研究》，1994年2期，頁61

西南官話的特徵尤以“古入聲歸陽平”極具代表性，並且許多學者以此作為方言分區的標準。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等學者根據湖北省境內西南官話區的研究，曾在 1948 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中提及“入聲歸陽平，這是西南官話一個最重要的特點”。⁹而在《官話方言的分區》中，李榮亦留意到了西南官話“古入聲今全讀陽平，與其他六區分開”的特點。¹⁰黃雪貞似乎對此也表示認同，但通過對西南官話的定義加以擴充，使得西南官話“古入聲歸陽平”的特性淡化，認為：

“古入聲今讀陽平的是西南官話，古入聲今讀入聲或陰平、去聲的方言，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調值與西南官話的常見調值相近的，即調值與成都、昆明、貴陽等六處的調值相近的，也算是西南官話。”¹¹

在另一方面，對於常德方言的古入聲歸派情況，學者的觀點則是大同小異，多認為大部分古入聲字歸去聲。鮑厚星在《常德十縣市方言聲調的特點》一文中將常德市的古清、次濁、全濁的入聲劃進了今歸去聲的範疇。¹²《常德方言志》一書也總結道：“大致說來，古入聲字派入到今日常德話的四聲中，以派入去聲的為多。”¹³又如易亞新所言：“古入聲字在湘西北各方言中分化並不嚴重……有的與去聲合流，如武陵……。”¹⁴鄭慶君則認為：“（常德音）沒有入聲，古入聲字大部分派入去聲，小部分派入陽平及其他類。”¹⁵李永明則透過統計的方式提供了確鑿可觀的數據，具體而言：常德方言 556 個中古音入聲字，有 523 個歸入去聲，例外有 7 個歸入陰平，22 個歸入陽平，4 個歸入上聲。¹⁶從學者觀點

⁹ 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等著《湖北方言調查報告（第 2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48，頁 1568

¹⁰ 李榮，《官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5 年第 1 期，頁 3

¹¹ 黃雪貞，《西南官話的分區（稿）》，《方言》，1986 年第 4 期，頁 266

¹² 鮑厚星，《常德十縣市方言聲調的特點——兼論常德地區方言的系屬》，《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1988 年第 5 期，頁 121

¹³ 滿大啓，《常德地區志 民俗·方言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頁 15

¹⁴ 易亞新，《湘西北普通話實用教程》，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7，頁 26-27

¹⁵ 鄭慶君，《常德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頁 4

¹⁶ 李永明，《常德方言（湖南方言系列）》，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頁 187-188

和實際語流來看，我們基本上可以認定“古入聲歸去聲”是常德方言的一大特徵。

常德方言的特徵為“古入聲今讀去聲”，而“古入聲今讀陽平”是西南官話的典型特點，但官方主流卻將常德方言納入西南官話區。如是背景下，本文試圖回顧歷史資料，結合衆家觀點，進一步探討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的關係。

一· 西南官話內部結構的地位差異

趙元任在早期所撰的《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China》一文中講到：“An extremely uniform group is South-western Mandarin, covering several provinces containing

Chungking, Kunming, Kweiyang, and Kweilin, extending eastwards in the form of a wedge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Wu-Han cities.”¹⁷事實上，該文所列舉的部分西南官話城市，成爲了日後學者列舉西南官話方言點的代表。李榮的《官話方言的分區》一文即列舉了上述城市作爲西南官話的典例：“西南官話包括成都、重慶、武漢、昆明、貴陽等地。”¹⁸除此之外，能夠代表西南官話的城市，對於李藍的《湖南方言分區評述及再分區》一文顯得尤爲重要。李藍批判了《背景》¹⁹方言分區選定的標準點，尤其是西南官話區的常德點，基於常德方言所隱含的湘語因素²⁰；其後，他選取了貴陽作爲西南官話的代表點，應用於“聲韻調系統三重投影法”再分區的體系中。²¹

從中可見，西南官話作爲一個偌大的官話方言區，其內部結構的各地區地位未必保持一致，而是主體和次體同存。因此，我們有必要透過歷史背景，瞭解西南官話的發展脈絡。

劉曉梅和李如龍將西南官話成形時期追溯至明代大移民：“史載明代將領沐英平定大西南後，江淮湖廣一帶漢人大量移居雲、貴、川，於是形成了西南官話。”²²周振鶴與游汝傑則認爲西南官話的發源地應是湘北荆南洞庭湖一帶，在第一次永嘉喪亂移民浪潮中出現雛形，在第二次安史之亂移民浪潮中奠定基礎。²³雖然二者對西南官話成形的歷史事件和時間界定不同，但是，從二者的論述中可見，西南官話的基礎應該有著“北民南移”的深刻烙印。

而呂儉平指出：“西南官話的發源地是中心，多層次的。發源中心有湖北、

¹⁷ Yuen Ren Chao,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02, No. 2 (Aug., 1943), 1943, 頁 63

¹⁸ 詳見李榮，《官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5 年第 1 期，頁 3

¹⁹ 詳見周振鶴，游汝傑，《湖南省方言區劃及其歷史背景（首次文摘）》，《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2 期，頁 55

²⁰ 詳見李藍，《湖南方言分區評述及再分區》，《語言研究》，1994 年 2 期，頁 61

²¹ 同上，頁 64

²² 劉曉梅，李如龍，《官話方言特徵詞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頁 16

²³ 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頁 49

四川、廣西、貴州等。”²⁴他又進一步指出：

“貴州那些最早的衛所，是漢族的據點，也是貴州的漢語方言中心，或者說是貴州的官話方言的中心，後來發展成爲西南官話的源地，比如貴陽、銅仁、畢節、安順等這些源地，經過發展競爭，貴陽成爲了更高層次的中心。”²⁵

歸結起來，我們可以發現：劉曉梅和李如龍、周振鶴和游汝傑、呂儉平三者，在各自的論述中都表示了西南官話的發源地應當包含湖北。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西南官話的早期基礎應與湖北地區關聯最爲密切；而呂儉平的觀點又與李藍在“聲韻調系統三重投影法”所持的標準相合，皆視貴陽爲當今最典型的西南官話中心點。

另外，結合周振鶴與游汝傑的論述，常德地處洞庭湖之北，則很有可能孕育了西南官話的早期基礎。但儘管如此，即使假定常德方言處於西南官話的內部結構中，常德方言也可能被列於非典型的邊緣地位。正如呂儉平所言：“湖南境內的西南官話方言點都有過渡性質。”²⁶而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藉由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的聲調聯係來探討“常德方言是否屬於西南官話”的問題。

二· 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的聲調聯係

對於“常德方言是否屬於西南官話”的問題，我們首先以西南官話的語音特徵來考察。本文緒論中講到，許多學者認爲“古入聲歸陽平”是西南官話的一大特點。但是，黃雪貞通過實地考察，發現雲、貴、川三省多地的古入聲未歸陽平而自成調類，且這些地方的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與西南官話常見調值基本無

²⁴ 呂儉平，《漢語方言分布格局與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關係》，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 351-353

²⁵ 同上，頁 353

²⁶ 呂儉平，《漢語方言分布格局與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關係》，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 350

異，得出結論“古入聲今讀陽平的是西南官話，古入聲今讀入聲或陰平、去聲的方言，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調值與西南官話的常見調值相近的，即調值與成都、昆明、貴陽等六處的調值相近的，也算是西南官話”。²⁷

那麼，我們試圖以調值比較的結果，來考察常德方言是否符合黃雪貞所立的西南官話的標準。

首先，“古入聲今讀去聲”是常德方言聲調的一大特質，符合黃雪貞所考慮的“古入聲今讀去聲”的條件對象，此不贅述。

接下來，比較常德方言的調值與西南官話主要城市的調值。

記錄常德方言聲調調值情況的資料有數種可供參考，我們選取了五種，分別來自鮑厚星²⁸、滿大啓²⁹、易亞新³⁰、鄭慶君³¹和李永明³²的記載。在此以圖表形式羅列，如下：

作者 \ 聲調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鮑厚星	55	24	21	35
滿大啓	55	24	21	35
易亞新	55	13	21	35
鄭慶君	55	13	21	35
李永明	55	13	31	35

從以上圖表中，我們可以發現五位學者對常德方言陰平與去聲的調值界定一致，陰平都是 55 高平調，去聲都是 35 高升調。上聲除李永明界定為 31 調值之

²⁷ 黃雪貞，《西南官話的分區（稿）》，《方言》，1986 年第 4 期，頁 266

²⁸ 鮑厚星，《常德十縣市方言聲調的特點——兼論常德地區方言的系屬》，《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1988 年第 5 期，頁 121

²⁹ 滿大啓，《常德地區志 民俗·方言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頁 14

³⁰ 易亞新，《湘西北普通話實用教程》，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7，頁 25

³¹ 鄭慶君，《常德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頁 16

³² 李永明，《常德方言（湖南方言系列）》，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頁 12

外，其他四位學者都認為是 21 調值，但調型都同屬降調。唯稍有出入的是陽平聲調的調值，鮑厚星與滿大啓界定為中升 24，其他三位學者界定為低升 13，但調型都屬於升調。

因此，我們通過對學者界定調值的衆數情況的統計，折中選取了一套聲調調值，即以易亞新和鄭慶君的標準作為參考，方便後文的論述。

常德方言的聲調情況則大體可被視為：

城市 \ 聲調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常德	55	13	21	35

在另一方面，黃雪貞所列的西南官話六個主要城市的聲調情況如下：³³

城市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成都	55	21	53	213
重慶	55	11	42	24
昆明	44	31	53	212
貴陽	55	21	53	24
武漢	55	213	42	35
桂林	44	21	53	35

我們發現：常德方言除陰平以外其它調類的調值雖然與成都、昆明、貴陽等城市調值相異較為明顯，但尤為特別地與武漢調值比較接近。

具體來看，常德方言的陰平和去聲調值與武漢相同，分別為 55 高平調與 35 上升調。並且，上聲同為降調調型，常德上聲調值為 21，武漢上聲調值為 42。唯陽平調值有所不同，武漢為 213，常德為 13，但常德升調與武漢曲折調後半部的調值相近。

³³ 黃雪貞，《西南官話的分區（稿）》，《方言》，1986 年第 4 期，頁 262

總的來說，常德方言古入聲今讀去聲，並且在調值上與武漢近似，滿足“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調值與西南官話的常見調值相近”的條件，所以應當符合黃雪貞所立的西南官話的標準。

此外，鮑厚星對黃雪貞的分區標準表示認可，並堅定了常德方言劃入西南官話區的態度。鮑厚星早先對常德方言區屬的看法不定，但後來黃雪貞所總結的西南官話的定義影響了鮑厚星對常德方言的看法。1985年出版的《湖南省漢語方言地圖三幅》包含了三幅地圖，分別是彭秀模等繪《湖南省漢語方言普查總結報告（初稿）》、楊時逢繪《湖南方言調查報告》以及鮑厚星基於二者再創的《一九八五湖南省漢語方言分區圖》。³⁴鮑厚星在《一九八五湖南省漢語方言分區圖》中把常德市劃入了西南官話區。然而，根據1986年鮑厚星與顏森合撰的《湖南方言的分區》的記載，常德方言卻屬江淮官話之常鶴片，而另一方言分區西南官話只強調了湘西與湘南一帶。³⁵這樣劃分的前後反差實則反映了常德方言分區的不明性和複雜性。直到後來1988年，鮑厚星考察並發現了“常德十縣市方言中有的保留入聲，入聲消失的又未併入陽平”。³⁶因此，他否定了此前將常德方言劃入江淮官話區的觀點，因江淮官話的古入聲今歸入聲，且多保留了收喉塞尾的特點。最後，他採納了黃雪貞對西南官話的定義，認為“常德十縣市方言還是以劃入西南官話為宜”。³⁷

儘管黃雪貞在西南官話分區的版圖中未將湘北常德一帶納入西南官話方言區內，但我們通過常德方言聲調及其對西南官話的定義的比較，以及參考鮑厚星對常德方言歸入區屬的態度轉變，我們認為黃雪貞對西南官話的重新定義實質上為常德方言劃入西南官話區開啓了大門。

³⁴ 詳見鮑厚星，《湖南省漢語方言地圖三幅》，《方言》，1985年第4期，頁273-276

³⁵ 詳見鮑厚星，顏森，《湖南方言的分區》，《方言》，1986年第4期，頁275

³⁶ 鮑厚星，《常德十縣市方言聲調的特點——兼論常德地區方言的系屬》，《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1988年第5期，頁123

³⁷ 鮑厚星，《常德十縣市方言聲調的特點——兼論常德地區方言的系屬》，《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1988年第5期，頁123

三·常德方言的西南官話過渡性質

正如緒論所言，黃雪貞與李榮都承認了“‘古入聲今歸陽平’是西南官話的一大特點”，並且以此作為方言區分區的條件標準。但是，相較而言，黃雪貞的分區標準顯然更加寬松。倘若我們執持著李榮“古入聲今全讀陽平”的嚴格標準，那麼，常德方言古入聲歸去聲與西南官話古入聲歸陽平不合的現象又當如何解釋？此處便涉及到呂儉平所認為的“過渡性質”的問題。

本文第二節“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的聲調關係”已經論述了常德方言的聲調調值最接近於六個西南官話典型城市中武漢方言的聲調調值，尤其是去聲調值

同為 35。而根據鮑厚星的推測，常德方言去聲調值與武漢完全一樣，是因為“歷來與武漢市交往更加頻繁的原故，常德市過去就有過‘小武漢’之稱”。³⁸

但是，對於入聲而言，我們已經得知：常德入聲歸派情況與武漢入聲歸派情況截然不同，前者轉入了去聲調類，後者轉入陽平調類。

通過略微早期的不同城市的入聲記載，我們發現：常德的入聲消變時間，與以武漢和成都為代表的西南官話主要城市不同。較早記錄常德方言聲調情況的文獻可見於《武陵縣志》，輯於清代同治時期。³⁹其中，《方音》一章共標列了五十八組漢字（亦有多個字為同組）及其當時聲調所屬調類或其對等同音字，描述形式如“你稱約靈”、“告讀作高又讀近豪”、“壓鴨讀作啞去聲”、“視是似市耜士俟讀作去聲”等。⁴⁰而在五十八組字中，有二十二組描述了具體的調類，但無一調類為入聲，僅僅提到了平聲、上聲和去聲三個調類。根據鄭清君的推測，“在清代同治年間，常德音已經沒有入聲”。⁴¹

然而，1899 年記錄湖北漢口方言聲調的《漢音集字》一書，描述了當時漢口方言仍舊保留了入聲，但書序中亦懇言當時下平（陽平）聲調與入聲之間出現不少混淆現象，而此為入聲開始消失之徵兆，其後至 20 世紀 30 年代的武漢入聲則已經全部消失。⁴²

另外，由清朝末期中國內地會傳教士鍾秀芝（Adam Grainger）編著的《西蜀方言》一書，記錄了同為 19 世紀末的川西方言狀況，其出版說明所呈列的聲調表中包含了五個調類，其中第五調類正是入聲，以“木、立、族、骨”四個典型

³⁸ 鮑厚星，《常德十縣市方言聲調的特點——兼論常德地區方言的系屬》，《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1988 年第 5 期，頁 122

³⁹ 《武陵縣志》卷之七，清同治二年刻本

⁴⁰ 同上

⁴¹ 鄭慶君，《常德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頁 8

⁴² 參考朱建頌，《朱建頌語文論集》，香港：香港新聞出版社，2003；轉引自鮑厚星，《湘方言概要》，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52-53

入聲字為字例。⁴³特別地，《西蜀方言》正文中講道：“The 5th tone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from the 2nd, being less abrupt than the 5th tone in Southern Mandarin. Still, it is a distinct tone and is not confounded with the other four tones as in Northern Mandarin.”

⁴⁴因此，該書記載了當地方言的第五調類（入聲）與第二調類（陽平）的混淆現象。而川西地區通常指成都平原地區，包括成都、德陽、綿陽、眉山四個地級市。倘若結合傳教士鍾秀芝的生平經歷，即“長期居住在成都金馬街 37 號，1904 年創辦‘聖經學堂’，1921 年在成都去世”，⁴⁵那麼可以推測的是，“川西地區”可能尤其指成都市。

如果從現有可參考資料對比三地入聲狀況，我們便會發現：常德入聲有史記載最早完成歸派，早於如今被列為西南官話之典型城市的武漢（漢口）與成都（川西地區），因為根據十九世紀末期的記載，武漢與成都的入聲尚處於與陽平磨合的混沌期。但是，上述記載卻不能佐證“常德入聲率先開始發生變化”。如果透過常德歷史行政地理與移民史來看，常德入聲開始發生變化的時間點可能反而要遲於武漢地區。若然，那麼常德方言完成入聲歸派所經歷的時間很短。

按照曹志耘對調類合併規律的解釋：“調類的自我合併也存在它的內在規律，這個規律就是調值越相近的調類越容易合併，或者說，調類合併的唯一依據就是調值的近似度。”⁴⁶特別地，曹志耘細述了入聲調由原來的短促調變為一般的長調的“延伸”過程：

“當入聲調發生這種‘延伸’的時候，僅從音理上說（不考慮外來因素的制約），如果‘延伸’的結果正好跟舒聲調裏某個調類的調值相同或十分接近，那麼這個入聲調就很容易歸入那個舒聲調。否則，這個入聲調將會保存獨立的調類

⁴³ 詳見鍾秀芝（Adam Grainger）編著，楊文波等校注，《西蜀方言》，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6，出版說明章頁 2

⁴⁴ 同上，正文頁 2

⁴⁵ 同上，出版說明章頁 1

⁴⁶ 曹志耘，《漢語方言聲調演變的兩種類型》，《語言研究》，1998 年第 1 期，頁 95-96

(儘管是長調)。”⁴⁷

那麼，假若常德方言發生“延伸”過程的入聲在很短時間內就完成了轉入舒聲調類，這就意味著常德方言的入聲調類與入聲容易歸進的那個舒聲調類之間的調值區分度很低，而武漢和成都的入聲較長時間處於與陽平的磨合期，則說明了其調類之間的調值區分度相對較高。對此，從該處也可看出，不單是常德方言古入聲歸去聲的結果，還有其歸派時間與其他西南官話主要城市的差異性，都是導致常德方言處於西南官話“邊緣位置”的因素。

如果參照曹志耘的聲調“延伸”理論，來考察黃雪貞所歸納的六個西南官話主要城市的聲調情況，⁴⁸那麼這些地方的入聲在消變的過程中應該是趨同於降調的，因為這些城市的陽平音主要為下降調型。特別地，武漢的入聲在消變的過程中應該跟曲折調趨同。

城市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成都	55	21	53	213
重慶	55	11	42	24
昆明	44	31	53	212
貴陽	55	21	53	24
武漢	55	213	42	35
桂林	44	21	53	35

而根據牟成剛的說法，在湖北中部、湖南西部及北部地區，入聲通常演變成上升調型。⁴⁹實際上，常德方言入聲歸派的結果為去聲，其去聲即為上升調型，因而其入聲在消變的過程中趨同於升調，這和西南官話主要城市的入聲演變成下降調型不同。

⁴⁷ 同上，頁 96

⁴⁸ 黃雪貞，《西南官話的分區（稿）》，《方言》，1986 年第 4 期，頁 262

⁴⁹ 牟成剛，《西南官話音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頁 304

同時，我們還發現，湘方言的代表城市長沙的陽平調類為上升調型。《漢語方音字匯》一書中所記錄的聲調情況如下：⁵⁰

城市 \ 聲調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入聲
長沙	33	13	41	45	21	24

這種情況無獨有偶，《湘方言概要》記錄了湘方言中整個長益片（包括長沙、株洲、湘潭等地）的方言，其陽平調值都為低升 13。⁵¹

除此之外，從湘方言的入聲歸派情況來看，湘方言中某些方言點的入聲也已經發生變化，甚至消失，而最終歸向了上升調型。根據鮑厚星的記載，湘鄉原來入聲的調值為 24，與陽平 13、次陽平 23 調型一致，而新寧原來入聲的調值為 24，與陽去 13 調型一致，湘鄉方言的入聲最終轉向了陽平和次陽平，新寧方言的入聲最終轉向了陽去，儘管二者分佈的調類結果不同，但事實上二者都是基於各自近似調值的調類轉化。⁵²因此，我們推測湖南境內的部分湘方言點，其方言裏已經發生轉化的入聲，在消變的過程中亦趨同於升調。

由此觀之，常德方言的陽平音與長沙乃至湖南其他地區湘方言的陽平音調值近似，加之常德方言的入聲和湘語部分方言點已發生轉化的入聲都趨同於上升調型，似乎例證了李藍所持有的“常德話本身含有相當的湘語因素”的觀點。

所以從常德方言的湘語性質的角度來看，若把常德方言作為西南官話區的範疇之一，那麼它的典型性是不夠明顯的。一方面，常德方言的入聲轉化在歷時與產物上與西南官話主要城市發生了分歧；而另一方面，湘方言的痕跡對常德方言游離於西南官話之主要性質以外產生了催化作用。兼顧此二方面，常德方言的西南官話之過渡性質和邊緣地位則是有跡可循的，且歷來學者對常德方言屬西南官

⁵⁰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王福堂修訂，《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頁 22

⁵¹ 鮑厚星，《湘方言概要》，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12

⁵² 同上，頁 55

話區的懷疑也是有因的。

既然常德方言在聲調上具備湘方言的因素而在西南官話方面呈現過渡性質，則究竟是否應該將常德方言劃入西南官話區仍然值得商榷。

四·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湘語的歷史聯繫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李榮抓住了西南官話的主要特徵，並且把西南官話分區的標準呈列出來，但是他自己對此也加以解釋說明：“無論官話內部的共性有多大，這樣簡單的表格只能是粗綫條的。何況方言在地理上的分佈又是漸變的。”⁵³

對於這種情況，丁邦新則對分區的標準提出了較為普適合理的觀點：“以漢語語音史為根據，用早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大方言；用晚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次

⁵³ 李榮，《官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5年第1期，頁3

方言；用現在平面性的條件區別小方言。”⁵⁴

因此，我們就要顧及到，分區標準的擇取和利用取決於分區對象的差別以及標準之間的關係，同時還需兼顧分區區際差異性和區內同源性。雖然常德方言作為一個方言點，而西南官話作為一個方言區，二者並不是對等的方言區區間關係，但對於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之間的關係，筆者採納丁邦新的觀點後，傾向於把二者放在大的歷史框架下探討，因為在處理比較模糊的、與屬區標準有出入且又不大可能劃入它區的方言點時，我們依然可以憑藉地理與歷史因素來尋找同源關係與差異性。並且以此，我們試圖尋找常德地區的歷史發展脈絡，探求其與西南官話地區乃至湘方言區的歷史聯係，這些也是我們能夠解釋常德方言的西南官話性質以及湘語性質的可供參考依據。

湖南地區早期的歷史痕跡，可能與荊地關聯。根據譚其驤對上古湖南境內民族之推測，湖南境內的民族起源可見於《詩經》中有關荊蠻之地的記載，《詩》曰：“蠻、荊來威”，又曰：“蠢爾蠻、荊，大邦為仇。”⁵⁵這些記載實反應了荊地乃蠻荒之地，自始與中原地區之民族不同。

又據譚其驤考察：

“至諸夏勢力之侵入湖南，則要始於戰國初吳起相楚悼王，南併蠻、越，取洞庭、蒼梧之地，於是湖南之東部湘、資二流域入於楚。其後復西向併吞沅、澧二流域，曰巫中，而湖南之全部皆入楚矣。是時湖南境內之民族，除土著之蠻夷而外，外來之移入者，當即為湖北境內之荊、楚民族。”⁵⁶

那麼，居於常德地區的主體可能來自兩個群體：一種是本先湖南境內之人楚者；另一種是遷自湖北境的荊楚移民。而無論何者，以常德地區位處湖南與湖北的交界地帶來看，常德地區的主體皆應與荊楚文化發生關聯。並且，參照譚其驤基於《後漢書》的考察，其中即有提及“洞庭”，對照地理位置來看，常德臨處

⁵⁴ 丁邦新，《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168

⁵⁵ 見《詩經》，轉引自譚其驤，《長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300

⁵⁶ 譚其驤，《長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300-301

今洞庭湖之西北，則也是與荆楚產生聯係的要因。

又根據周振鶴與游汝傑的論述：“戰國初年，楚國南取洞庭、蒼梧之地，其後西併沅澧流域，置黔中郡，湖南全境遂屬楚所有，通行古楚語……在湖南境內的古楚語後來則逐步演化為古湘語。”⁵⁷因此，周振鶴與游汝傑認為當時荆楚之地通遍使用的方言即是古楚語，而這也是湘語的源頭。那麼結合這點來看，常德早期方言曾有著古楚語的歷史脈絡。並且，袁家驊也認為：“古楚語包括湖北、湖南（‘南楚江湘之間’）和長江中游南岸一帶，所以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今天湘語的前身。”⁵⁸

但值得置問的是，春秋戰國其間所歷時期甚短且紛亂為多，足具對語言統一發展產生深刻影響？對此，彭建國與彭澤潤提出的兩種解釋較為合理自然：其一，戰爭頻繁，領地消長，楚國與中原交流密切，一定程度能夠減緩各個地區方言獨立發展；其二，楚國早期占地的本土民居既是少數民族，則楚國為了夯實政權，勢必加速內部溝通融合。⁵⁹

可是在後來，“秦統一中國後，實行郡治時將湘資流域與沅澧流域分開，分設長沙郡和黔中郡，奠定了湖南歷代政區的基礎。”⁶⁰這樣就直接導致了常德地區和長沙地區的發展各自走向分化。結合《常德地區志·地理志》⁶¹中的歷代常德政區分屬來看，自從西漢時常德被劃入荊州以後，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常德地區就與同屬政區的今湖北部分地區聯係甚為密切。

周振鶴與游汝傑認為：“方言是歷史的產物，歷史上的行政地理對方言區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二級行政單位——府（或州、郡）內部政治、經濟、文化、交通各方面的一體化自然會促使方言的一體化。”⁶²由此，從歷史行

⁵⁷ 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頁 46

⁵⁸ 袁家驊等著《漢語方言概要（第 2 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頁 19

⁵⁹ 詳見彭建國，彭澤潤，《湖南方言歷史研究》，《湖南社會科學》，2008 年第 1 期，頁 157

⁶⁰ 鮑厚星，《湘方言概要》，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3

⁶¹ 詳見李大年，《常德地區志·地理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頁 6-28

⁶² 詳見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頁 68

政地理的角度來闡釋方言的演變與發展歷程，常德地區的方言在此後的發展過程裏則應當與湖北地區的方言逐漸走向一致。

而另一方面，“由北方移民浪潮形成的官話方言主要集中在黔中郡所及的範圍，而繼承古湘語的現代湘語顯然是以長沙郡所及的範圍為主要地盤”。⁶³當此可以推斷，在日後的方言發展過程中，常德方言逐漸從湘方言的主要輻射範圍內抽離出來，且不斷吸收以北方民族為主的南遷群體的語音元素。

從移民特徵來看，西晉永嘉喪亂與唐朝安史之亂導致的“北民南移”最具歷史規模，且其浪潮打破了洞庭以北、荊州之南的原有方言格局。李葆嘉認為，肇始於永嘉之亂的第一次人口遷移高潮使得“洞庭北部出現了西南話的雛形，從秦雍沿漢水流域到達洞庭流域的居民成為西南話的祖先。”⁶⁴周振鶴與游汝傑認為：“（安史之亂）如此大量的移民必然帶來北方方言的巨大衝擊，從而取代了荊南地區的固有方言，而奠定了西南官話的基礎。”⁶⁵因此，結合地圖來看，李葆嘉與周振鶴及游汝傑的觀點實際上點明了常德方言即是西南官話的發源地。

並且，按照本文第一節中我們探討過“西南官話的發源地應當包含湖北”的結論，那麼，又從常德與湖北部分地區的歷史源流以及行政地理來看，常德方言則是應該被考慮在西南官話區範圍之內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史之亂中，“湘資流域下游的湘語也受到北方話的影響而淡化”⁶⁶，並且“到達湘資流域下游地帶的北方方言跟原有的湘語的接觸和交融奠定了今天新湘語的最初基礎。”⁶⁷從湘方言受北來的西南官話影響的角度來看，較早時期趙元任曾將湘方言納入西南官話區也就不足為奇。⁶⁸假若我們肯定

⁶³ 鮑厚星，《湘方言概要》，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3

⁶⁴ 李葆嘉，《漢語方言格局歷史演變論略》，《吉林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頁54

⁶⁵ 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頁49

⁶⁶ 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頁49

⁶⁷ 同上，頁109

⁶⁸ Yuen Ren Chao,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02, No. 2 (Aug., 1943), 1943, 頁65

了如此可能性，那麼常德方言相較於湘方言則更應具備西南官話之代表性。

總的來說，常德方言有著深遠的西南官話早期基礎的背景，其一方面來自常德歷史行政地理與湖北地區的聯繫，另一方面又來自北民南移浪潮的深刻影響。我們同時也能夠發現，在更早的歷史時期裏，常德方言與古楚語、古湘語有著語音聯繫，甚至其中有的作為底層成分保留至今。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湘語的歷史聯繫，應當與其語音特徵互為例證，而這我們在本文第二節以及第三節已經有所探討。

五·常德方言以劃入西南官話區為宜

根據上述常德方言的聲調特徵以及歷史源流，我們可能首要考慮西南官話與湘方言作為常德方言可供劃入的區屬。如果按照趙元任把湘語作為西南官話的一部分來看待，那麼給常德方言分區的結果顯而易見，即常德方言屬於西南官話區。但是，在通常情況下，按照現行的《中國語言地圖集》等權威性著作，湘方言之於西南官話並不表現為從屬關係。根據鮑厚星的概括，湘方言可按以下標準分區：

“一般情況下，用①（古全濁聲母舒聲字今逢塞音、塞擦音時，無論清濁，一般都念不送氣音）②（古塞音韻尾完全消失，也無喉塞尾；）兩條就可把湘語同其他各大方言劃分開來。當和西南官話發生劃界問題時，加入③（蟹、假、果攝主要元音形成[a]、[o]、[ɨ]序列；）④（聲調五至七類，絕大多數去聲分陰陽；）

條考慮。”⁶⁹

若從上述鮑厚星列舉的湘語特徵及其分區標準來看，常德方言被劃入湘語區則顯然格格不入，因為古全濁塞音在今常德方言中念送氣音，並且常德方言聲調僅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調類，而且去聲也不分陰陽。⁷⁰

至於考慮將常德方言劃入鮑厚星早先曾認為的江淮官話區，則亦不甚妥當。江淮官話的典型特點為古入聲今歸入聲，並且該入聲還保留了喉塞音尾。⁷¹而我們已經得知，常德方言的特點為古入聲今歸去聲，並且沒有保留喉塞音音尾的聲調類型。

因此，反復權衡之後，若以常德方言的區屬視角來看，我們認為將常德方言納入西南官話區仍然具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第一，雖然李榮等學者以“古入聲今歸陽平”作為西南官話的分區標準，但這並不是絕對的，對於比較模糊的、與屬區標準有出入且又不大可能劃入它區的方言點，我們可以酌情考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第二，通過對湘方言和西南官話的主要城市的聲調情況考察，我們發現儘管常德方言有其難以避免的湘方言因素，但若參考黃雪貞的標準，認同其與武漢方言的聲調有共通之處，即應當以劃入西南官話區為宜；第三，以歷史發展過程而言，常德地區可能為西南官話的早期基礎，當然這有待進一步考證，儘管在語音聲調層面，它與現行西南官話的主要城市有所差異，但西南官話內部結構中的主體和次體乃是同存，因而從歷史源流以及西南官話之過渡性質與邊緣地位來審視，將常德方言納入西南官話區自也無不妥之處。以上種種，慎重之下，筆者認為常德方言仍以劃入西南官話區為宜。

⁶⁹ 鮑厚星，《湘方言概要》，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5-6

⁷⁰ 滿大啓，《常德地區志 民俗·方言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頁 20

⁷¹ 鮑厚星，《常德十縣市方言聲調的特點——兼論常德地區方言的系屬》，《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1988 年第 5 期，頁 123

六·結論

本文以常德方言的區屬作為中心立意，探討了關於“常德方言是否應劃入西南官話區”的問題。雖然先前已有權威著作肯定了“常德方言劃入西南官話區”這一觀點，但也有學者對常德方言的西南官話性質表示懷疑，有的認為其附帶了相當的湘方言因素。

在西南官話的內部結構體系內，不同的方言點表現出了主次地位。在許多學者看來，常德方言並不是西南官話的代表點，即使它可能有著西南官話的早期基礎。

對於常德方言區屬關係的探討，我們試圖以語音特徵的考察作為出發點。李榮等學者認為西南官話的主要特徵是“古入聲今歸陽平”，並以此作為分區標準。但我們同時也發現，常德方言的特點是“古入聲今歸去聲”。因此，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區屬標準有所出入。但是，黃雪貞對西南官話的補充定義，使得常德方

言合乎其所定義的西南官話標準，而反映的結果表現在常德方言與武漢方言的調值近似。

如果以李榮的音韻標準來看，常德方言的確不應屬於典型的西南官話。常德方言具有西南官話的過渡性質，表現在湘語因素，以及與西南官話主要城市入聲演變的差異性和非同步性。

在音韻基礎上，我們通過對常德方言與西南官話、湘方言歷史聯係的考察，發現常德方言有著古楚語、古湘語血脈，但同時又深受以湖北為主體的西南官話區的歷史行政地理與北來移民的影響。

結合以上論述及考察，權衡之下，我們得出結論“常德方言以劃入西南官話區為宜”。

參考書目

1. 專著

鮑厚星，《湘方言概要》，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王福堂修訂，《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丁邦新，《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李永明，《常德方言（湖南方言系列）》，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16。

劉曉梅，李如龍，《官話方言特徵詞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

呂儉平，《漢語方言分布格局與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關係》，北京：中華書局，2019。

滿大啓，《常德地區志 民俗·方言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

牟成剛，《西南官話音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譚其驥，《長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武陵縣志》卷之七，清同治二年刻本。

易亞新，《湘西北普通話實用教程》，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7。

袁家驊等著《漢語方言概要（第2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等著《湖北方言調查報告（第2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48。

鄭慶君，《常德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編《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1987。

鍾秀芝（Adam Grainger）編著，楊文波等校注，《西蜀方言》，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6。

朱建頌，《朱建頌語文論集》，香港：香港新聞出版社，2003。

2. 論文

鮑厚星，《湖南省漢語方言地圖三幅》，《方言》，1985年第4期。

鮑厚星，《常德十縣市方言聲調的特點——兼論常德地區方言的系屬》，《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1988年第5期。

鮑厚星，顏森，《湖南方言的分區》，《方言》，1986年第4期。

曹志耘，《漢語方言聲調演變的兩種類型》，《語言研究》，1998年第1期。

陳暉，鮑厚星，《湖南省的漢語方言（稿）》，《方言》，2007年第3期。

黃雪貞，《西南官話的分區（稿）》，《方言》，1986年第4期。

李葆嘉，《漢語方言格局歷史演變論略》，《吉林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李藍，《西南官話的分區（稿）》，《方言》，2009年第1期。

李藍，《湖南方言分區評述及再分區》，《語言研究》，1994年2期。

李榮，《官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5年第1期。

彭建國，彭澤潤，《湖南方言歷史研究》，《湖南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

周振鶴，游汝傑，《湖南省方言區劃及其歷史背景（首次文摘）》，《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2 期。

3.英文

Yuen Ren Chao,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02, No. 2 (Aug., 1943), 1943, p.65.